

中臺灣研究專題導讀

許世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

中臺灣顧名思義是指臺灣西部平原的中間地帶，不過由於這並非正式的行政區域名稱，不容易界定其精確範圍。若從較寬鬆的角度，似乎可以包括今苗栗到雲林之間，相當於日治初期的「臺灣（中）縣」；但如果以近代臺灣區域治理的角度而言，則以現今中、彰、投三縣市的範圍較為具體。1920 年，總督府在臺灣推行「州廳—郡市—街庄」的行政區劃，將全臺劃為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州及花蓮港、臺東二廳（1926 年高雄州轄下的澎湖郡升格為澎湖廳），其中臺中州下分出 11 郡及臺中市（1933 年增加彰化市），管轄範圍正好就是今日的中、彰、投三縣市。這樣的行政區劃，讓三個縣市從 1920 年以來，除了行政上的一致性外，社會經濟、教育文化方面也經常被視為一體，始終維持相對緊密的關係。舉例而言，1923 年設立於臺中市川端町（今西區）的第二代「臺中師範學校」，其學生來源除日籍以外，多來自此三縣市；1926 年整併成立於臺中市柳町（今中區）的「臺中州青果同業組合」，扮演著當時中彰投地區農產品的交易大腦所在；1928 年在臺中市成立第一所專業培養漆藝人才學校「工藝傳習所」的山中公，其作品強調臺中的在地意象，經常出現的圖騰，卻是邵族的杵歌；而當時來到臺中州遊覽的日本觀光客，若想要一窺臺灣「蕃人」（原住民）的面貌，位於南投日月潭的邵族更是首選。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雖將臺中州改為臺中縣，但轄區並無變動，且當時臺中縣的行政中心是放在現今彰化縣的員林，直到 1950 年施行地方自治後，才讓臺中縣、市、南投縣、彰化縣各自分家。然而，長期建構的共同生活圈，並未因著行政區劃變革而沉寂，反隨著便捷的交通與工業化的發展而更形密切。時至今日，三縣市間跨區往來已成常態。例如，每日有不少上班族或學生從南投、彰化進入臺中市通勤、通學；同一時間也有許多臺中市民，特別是退休長者，清晨天未亮即在臺中高鐵站等待公車上溪頭攬勝；每到假日或百貨公司周年慶，經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前來臺中的鄰近遊客更是絡繹不絕。2015 年前臺中市長林佳龍之所以主導成立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臺，並非憑空想像而出。

本區域西從臺灣西海岸，東至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稜脊，形勢完整；高度從海平面上升到海拔 3,000 公尺以上。自然景觀面貌多元，包括海岸平原、臺地、丘陵、山地、高原、高山等不同地形區，以及熱帶、副熱帶、溫帶、寒溫帶等不同氣候區，臺灣可見的各種地形及氣候，幾乎完整出現在此。大安、大甲、大肚、濁水四條重要溪流或貫穿本區，或流經南北，除了帶來豐沛的水資源，更成為前近代時期人群移動的重要孔道，由於地形及自然條件適合人居，自古以來即為人群活躍的地區之一。境內族群繁多，包含道卡斯、拍瀑拉、巴宰、巴布薩、洪安雅、布農、泰雅、邵族等早期的南島語族，以及 17 世紀之後大量移入的漳、泉、汀、潮等中國漢系移住民；20 世紀上半，又有來自新竹州的「北客」；20 世紀下半則加入跟隨國府來臺的中國新住民，以及國際化浪潮下的南方新移民，多樣化的族群，也形塑出不同面貌的信仰及文化。1970 年代「濁大計畫」的施行，開啟學者對本區域的研究興趣，其後的相關成果不絕如縷，特別是因應本區域多樣化的族群以及豐富民間信仰而來關於南島語族社址、社域、族群關係、區域開墾、祭祀圈、信仰圈等方面的研究，前輩學者皆已奠下良好的基礎。不過隨著時代變遷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各種在地研究方興未艾，近年已常見「彰化學」、「臺中學」、「南投學」等研究主題；可以想見，新的研究議題勢必源源不斷的出現。

本專題「研究論文」部分，共審查通過收錄四篇論文，第一篇是筆者與賴逸蓁小姐合撰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前後天主教會禮儀用品的變化——以臺中教區第一總鐸區教堂文物為例〉，天主教會於 1858 年再度來臺開展福傳事業，1875 年來到中部羅厝（今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1914 年傳入臺中，在臺灣中部的傳教歷史已逾百年，留下許多珍貴的宗教文物，成為延續歷史與文化的最佳見證。近年來天主教會臺中教區除致力於書寫教會歷史外，也開始有計畫進行教會文物普查，筆者藉由參與 2020 年「臺中市天主教臺中教區第一總鐸區教堂文物普查建檔計畫」工作，發現各個堂區有部分禮儀用品，雖使用在相同的儀式中，但隨著時間不

同，其形制與意涵有若干變化，經過進一步探究，得知似乎與「梵二」有相當的關聯性。「梵二」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的簡稱。1962 至 1965 年間，教宗在梵蒂岡舉行第二屆大公會議，其精神在於更新教會，促進基督徒的合一，是教會有史以來首次公開自我反省評估、檢討、定位、更新與策劃自己在現代世界中的角色，影響及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以往有關梵二的研究，多半是針對相關文件進行個別探討，少見以個案觀察的方式探討會議前後禮儀儀式與禮儀空間之變化及其對禮儀用品變化所造成的影響。本研究以天主教會臺中教區第一總鐸區教堂文物為例，透過祭臺位置、彌撒儀式、教堂內部擺設、聖職人員祭披、聖洗簿紀錄方式等面向之變化，呈現梵二所強調的合一與本土（地）化之內涵，並作為變革前後之見證。天主教對臺中地區的教育、醫療、社會弱勢服務貢獻極大，然而，由於以往教會對自身與臺灣社會互動的相關歷史缺乏有系統整理書寫，加上多數臺灣史研究者對天主教在臺歷史缺乏特別關注，以致教會歷史在臺灣史相關研究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本文透過教會歷史文物的清點與詮釋，嘗試填補這一方遭忽視已久的歷史。

第二篇是林蕙安博士生所撰的〈從戰後臺灣的國家文化論述看臺中市民俗公園的創建與詮釋〉，本研究以戰後到 1990 年代的文化政策發展為主軸，聚焦於國家對臺灣在地文化從遺忘到喚醒的過程，以及政策背後反映之國家文化論述。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將臺灣視作反攻復國的跳板及維護中華文化道統的復興基地。在此背景下，國家推廣之文化皆以中國大陸為主體，將得以連結「正統中國」之文化表徵在作為暫時基地的臺灣進行「復興」，從推廣「國畫」（文人水墨畫）、「國劇」（京劇）到保存宮廷古器物與建造中國宮殿式建築等，不一而足。1970 年代後，在國際情勢轉變與民間大聲疾呼的聲浪下，臺灣在地紋理於國家政策中長期不在場處境開始有了改變。隨著 1982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頒布，臺灣的在地文化有了法源依據，開始古蹟的指定及民間習俗活動的推廣。惟此時國家仍然強調其正統中國之政

權與中華文化道統之地位，這段文化政策轉折期，與其說是國家對臺灣的在地文化從忽視轉為重視，不如說是國家在國際與國內情勢之轉變下，改變對中國國族文化論述的詮釋方式。直到 1990 年代中期，戰後以來長期建構的中國國族文化論述終於有了關鍵性轉變，轉而以臺灣為主體，強調臺灣蘊藏的多元文化，以及由下而上、以民為主的社區總體營造。

作者藉由「臺中市民俗公園」為例，將園區的經營主題與上述國家文化論述相對應。民俗公園竣工於 1986 年，1990 年正式開幕，不僅是 1980 年代全臺灣第一個從外觀到內部皆作仿古打造的民俗公園，更是今日仍在營運的少數民俗主題園區。起初的成立宗旨是企圖透過外觀建築與內部環境之營造重現整體「先民」文化，提供遊客到此緬懷過去、凝聚民族精神。全區從建築景觀、內部擺設到文物典藏，皆是以漢系移住民之食、衣、住、行、娛樂等生活面向為大宗，從中上層人家之廳堂擺設、看戲娛樂、園林造景、品茗休閒，到一般農家之農村生活，不一而足。在此處被緬懷的「先民」，無疑是指稱清領時期以來的漢移民，其生活點滴則被作為臺灣人民遙想「傳統中國」與「尋根」的管道。至於公園中呈現的少量原住民族相關文物，則不屬於「先民」之列，亦被排除於當代臺灣人的各種集體記憶與身體實作經驗中。1990 年代中期後，公園開始被賦予不同的詮釋。園區所展現的漢移民生活不再被用以連結中國根源，而是成為臺灣多元文化之一員，與其他族群一同豐富了臺灣文化之內涵；各種凸顯臺灣主體性的特殊歷史經驗，被放置到文物的介紹與說明之中；有關園區內的建物與展示，也不再被用以強調與遙想「傳統中國」及凝聚共通的中華民族精神，而是從地方社區的角度，期望每一位民眾都能藉由民俗公園來懷想與訴說屬於自己在這片土地上的多元故事。從成立時間的關鍵性及後續發展的延續性來看，臺中市民俗公園除了作為探究 1970-1990 年代國家文化政策轉型期的重要代表，更提供進一步發掘在歷經 1990 年代中期臺灣本土化意識崛起下，此類仿古民俗園區呈現出怎樣的詮釋轉變。

第三篇是邱正略教授所撰的〈地方志編纂的史料運用：以《續修南投市志》〈沿革篇〉、〈社會篇〉為例〉，作者曾多次參與地方志的編纂工作，也曾撰文分享地方志的編纂經驗。《南投市志》於 2002 年出版，距今已逾 20 年，2021 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承接南投市公所委託的《續修南投市志》編纂計畫，邱教授承擔〈沿革篇〉、〈社會篇〉撰稿人，力圖延續前志並補充前志之不足。本次續修與原《南投市志》有不少差異：首先是篇章架構變化不小，〈沿革篇〉為前志所無，編纂時儘量以不過多重覆前志內容為原則，重點呈現重要史事、行政區劃沿革及各里特色；〈社會篇〉部份，雖然篇名相同，但內容迥異，主要是因應《續修南投市志》11 篇的架構所做的調整。其次，在史料運用方面也與前志有所差異。〈沿革篇〉引用大量古文書，也善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相關檔案；〈社會篇〉則參考歷屆市民代表會議事錄的工作報告，呈現社會救助與社會福利業務成果，參考南投縣政府社會處的人民團體資料，對於南投市各種人民團體分類表列呈現。兩篇內容也運用大量田野訪問資料，呈現各里的特色、景點，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概況。本文是作者參與本次編纂計畫，運用過去的經驗，加上本次編纂經歷所撰寫的經驗分享。作者在文中詳述田野訪問計畫的擬定與執行過程，並強調委託單位協助的重要性；同時也分享在修志田調過程中可能有的意外收穫及遺憾不足之處。作者認為雖然參與地方志編纂的撰稿人大多不是該縣市、鄉鎮的在地文史研究專家，但只要具有編纂經驗，足以掌握基本參引史料及編纂方法，並善用田野訪問，請教在地的耆老、意見領袖、文史工作者，便可以彌補這項不足。

第四篇是逢甲大學王志宇教授的〈臺灣鸞堂的鸞筆形式與變遷——以儒宗神教為中心〉，鸞堂的鸞筆是扶鸞儀式中的重要法器，本文以臺灣的鸞堂在進行扶鸞儀式時所使用的鸞筆為對象，透過民間教派——儒宗神教的發展，考察日治時期以來鸞筆的發展及其變化。日治時期楊明機以扶鸞方式，寫出儒宗神教法門，四處推廣扶鸞。在其推廣下，儒宗神教受到一批鸞門人士的

認同。1956年楊明機扶鸞出版《六合皈元》以後，就不再四處扶鸞著書，1971年後漸淡出鸞堂的舞臺。而戰後的鸞堂也有了新的變化，有些鸞堂由武乩壇轉換而來，有些則是新興鸞堂，這些鸞堂所使用的鸞筆，已不是過去儒宗神教的桃枝柳木的鸞筆，而出現了佛手乩、葫蘆桃筆等，此種發展與戰後政權易手有關，當鸞堂不再面對異族統治，保存漢文化的壓力不再，鸞堂的教派化需求就沒有那麼強烈，傳統鸞筆傳說背後所代表的儒家或道教的正統象徵意義，也就可不再全力維護，在民間信仰各有不同扶乩源頭的情況下，戰後鸞堂的鸞筆形制也就趨於多元。作者長期浸淫相關領域，研究成果豐碩。本文雖以全臺的宏觀性角度描述從日治到戰後的鸞筆形式變化，惟不少田野資料取材自中臺灣，如彰化縣田尾鄉「聖德宮鎮化堂」、臺中市「聖壽宮」，乃至彰化縣芳苑鄉臨海路上「王功林希元祖廟」。林希元祖廟原是王功地區林氏宗族所建立的祖先信仰，並以林祖信仰為主體，凝聚宗族力量，成為王功林氏宗族對抗鄰近地區異姓宗族的利器。其後定期請林祖移駕公廳起乩濟世，為莊民處理病痛或難解之事。透過本文可以一窺中臺灣鸞堂信仰來源的多元性。

其次，有關「田野調查」的部分，本期收錄邱敏捷教授所撰的〈從齋教到人間佛教：以南投靈山禪寺的發展為例〉，臺灣佛教發展從齋教、日本佛教、漢傳佛教，一路演進為今日印順法師所倡導之人間佛教，其中新竹縣新埔鎮客家徐氏家族的德妙法師與致中法師是重要的佛教人物，他們所開拓、經營之南投靈山禪寺起於日治時期的齋教，一度附於日本佛教曹洞宗，再經漢傳佛教，最後轉而為現代人間佛教的道場。1958年，德妙法師將草創於1936年的簡陋道場，重建為頗具規模的靈山禪寺，用心規劃大雄寶殿，妥善設計楹柱聯語，使其成為南投縣名間鄉一所知名且有特色的佛教道場。1987年承繼靈山禪寺住持的是德妙法師侄子致中法師，他深受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啟發，在原有厚基上，成立悲廣文教基金會、舉辦各種研習營、興建「正觀學處」、辦理禪修營、出版與發行《正觀》、設立德妙佛學資料

中心等多元弘法利生志業，進而使該寺從傳統佛教走向現代人間佛教。靈山禪寺的演進，可說是認識與瞭解臺灣佛教從齋教一路隨時代發展而轉化為當今實踐人間佛教的範例之一。

本專輯第三部分「研究討論」收錄兩篇文章，第一篇蕭信宏先生的〈清康熙年間的鹿港補遺〉，作者為鹿港在地人，藉由比對古地圖及查閱清代文獻，對清代鹿港提出幾個新的觀點：首先是由康熙 24 年（1685）蔣毓英《臺灣府志》「鹿仔港」的名稱推論荷蘭時期鹿港已有漢人的活動；其次，作者確認不論是蔣毓英《臺灣府志》或康熙 34 年（1695）高拱乾所修之《臺灣府志》，其中所記載的「半線港」就是鹿港；第三，作者認為鹿港興安宮並非如以往所認為的由興化人草創，實際上是康熙 22 年（1683）後，閩安水師進駐鹿港並草創興安宮，在興安宮附近形成兵丁、同籍人的生活聚落，康熙年間的興化人應該是因為同籍關係，來到鹿港依附在閩安協轄下的興化水師官兵駐地，而跟興安宮產生連結；第四，以往的說法認為鹿港屬於馬芝遴社，作者透過古地圖發現約在康熙 43 年（1704）以前鹿港為鹿港仔社的社域；第五，康熙 43 年鹿港仔社消失之後，漢人北上開墾中北部，鹿港舊祖宮應該草創於鹿港仔社消失後，此時的鹿港漢人漸增，廟位在碼頭區，規模很小；第六，透過古今地圖比對以及史料查證，康熙年間古濁水溪（大武郡溪）的河道大變動有可能是導因於康熙 33 年的大地震；第七，康熙末期施世榜家族可能選擇利用康熙 33 年大地震之前的舊大武郡溪河道來做為八堡圳的基礎渠道，俾能降低開圳工程的困難度。與鹿港相關的研究不少，惟本文則從細微處適度修正前此研究的盲點。

第二篇是地理學者周國屏教授的〈臺中市各區人口成長類型之探討（2010-2020）〉，本文旨在探討臺中市於 2010 年底改制升格為直轄市後，10 年內各區人口分布與成長的概況，主要聚焦於自然增減與社會增減在各區人口成長所扮演角色之更迭。作者採用 Webb（1963）八種類型分析法，逐區進行統計分類。研究結果發現：從 2010-2020 這十年間，全市人口增加

6.51%，淨遷入人口（社會增加）遠大於自然增加人口，人口變動屬於 C 型（自然增加＜社會增加）。全市有 20 區（68.97%）人口呈現增加趨勢，其中 7 區（東區、清水、梧棲、大雅、龍井、霧峰、大里）屬於 B 型（自然增加＞社會增加），8 區（南區、西屯、南屯、北屯、沙鹿、潭子、烏日、太平）屬於 C 型，4 區（豐原、后里、神岡、大肚）屬於 A 型（自然增加＞社會減少），D 型（自然減少＜社會增加）僅有 1 區（和平）。然而全市亦有 9 區（31.03%）屬人口減少區域，其中 G 型（自然減少＜社會減少）有 5 區（中區、東勢、新社、石岡、大安），H 型（自然增加＜社會減少）有 4 區（西區、北區、大甲、外埔），但未見 E（自然減少＞社會增加）、F（自然減少＞社會減少）二型的人口變動。整體而言，都市核心與偏遠地區為本市社會減少（淨遷出）嚴重地區，加以人口結構老化，自然增加有限，甚至為自然減少，故成為 G、H 二型優占區，人口變動類型較多元；近郊、遠郊二帶則是主要人口淨遷入區，為 C 型優占區，人口變動類型較單純，全屬人口增加區。透過作者地理專業的分析，得以清楚得知臺中市各區在升格後的人群移動模式與類型。

綜觀本期與中臺灣相關的七篇研究論著，以空間分布而言，臺中市有 3 篇、南投縣有 2 篇、彰化縣 1 篇，另有 1 篇則屬於跨區域研究；就時間而言，除了 1 篇聚焦在清領以前時期外，其餘 6 篇都集中在戰後以迄當代。至於研究主題則包含天主教會禮儀用品的變化、戰後臺灣的國家文化論述、地方志編纂的史料運用、鸞筆形式與變遷、人間佛教的發展歷程、鹿港區域史、直轄市人口成長類型；學術範疇涵蓋了歷史學、民俗學、宗教學、方志學、文物學、地理學等面向，展現出較以往區域研究更為多元的風貌。而撰述作者，除任教大學院校的專業學者外，也有相當比例是初進學術殿堂的後起之秀，對中臺灣研究的長遠發展而言，毋寧是值得欣慰的。

